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东帝汶维和亲历记

报告文学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东帝汶维和亲历记（节选）

徐志达

东帝汶维和亲历记（节选）

徐志达^{*}

打击海滩犯罪

东帝汶是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，对男女之事，非常保守。在印尼统治的二十多年里，虽然娼妓十分盛行，甚至达到了半公开的程度，但印尼属穆斯林国家，对女子的服饰要求也很严格。目前在东帝汶，当地女孩子的服饰受联合国人员影响，虽然越来越开放，暴露的范围越来越大，但还没有女子穿泳装到海滨游泳的。偶见女孩子到海边玩耍，也都是穿着衣服跳进海里，根本不是游泳。东帝汶是个炎热的赤道国家，联合国的女性在工作之余，当然不会像当地人一样包裹自己，特别是白人女性，更加着重突出自己优美的曲线和性感的一面。由于任务区条件艰苦，许多联合国人员都临时结成“露

^{*} 徐志达，1966年生，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，现任公安部警卫局中校。本文节选自《东帝汶维和亲历记》第6章，群众出版社，2001年5月出版。

水夫妻”，以共同渡过那难熬的苦闷时光。因此，每当黄昏或节假日，到处可见联合国的人员成双成对，出入于餐馆和海滨。可能当地男性对这突如其来的诱惑没有任何文化和心理准备，于是，针对联合国人员特别是白人女性的犯罪突然猛增。白人女性被当地男子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案件时有发生。

11月24日，在科摩罗管区的海滨，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伤害外国人、强奸（未遂）外国人的案件。

21时30分左右，一名澳大利亚籍男子（某建筑公司职员）与他的美国籍女友（某NGO人员）一起来到了海边沙滩。23时左右，一伙当地男子突然来到他们面前，不由分说，上来就将那位澳洲男子拉到一边痛打！一个家伙捡起地上的一块儿石头，猛击其面部，将其颞骨击碎。另外几个人则撕掉美国女子的衣服，企图进行强奸。两人拼命挣脱了他们的袭击，一同跳进海里。两人游出几十米后，在海中朝有灯光的使馆区方向游去。半途中，澳洲男子由于伤势过重，精疲力竭之下，绝望地对其美国女友说：“我坚持不住了，就让我死在这里，你自己逃生去吧！”他的女友还算个有情意的女子，坚持救他同走，不肯丢弃他。这时，那些家伙中的三个又划着一条小渔船追了上来。那位美国女子用葡萄牙语哀求道，“求求你们，救救他吧！”三人中的其中一个也用葡萄牙语答道：“好吧，我把你们带到我们那里救护！”美国女子仍不放心地问：“你能向上帝发誓吗？”那男子答道：“好吧，我发誓。”这样，他俩才同意随他们一同上岸。快到岸边的时候，美国女子发现有两辆车闪着警灯朝这边开来，马上大声呼叫救命！其中一个男子企图用手捂住她的嘴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快

速反应防暴队的人已经听到了呼救，跳下车后将在场 7 人悉数拿获，并将受害者送往医院救治。

25 日大清早，我接到命令，让我局到监狱将昨晚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提审、侦讯，因为案件发生在科摩罗的管区内。我带人来到监狱的接待室，发现一位邻居坐在那里。由于她是联合国某人权官员的翻译，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所以我们平时偶有交谈，还算熟悉。今天见到我的到来，她异乎寻常地热情，并向在场的警察称我为“最好的朋友”。我知道，这也是“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”的，就问她是怎么回事，她说她的丈夫被误抓到这里。我来到那 7 个嫌犯的监室，发现几乎全部是熟悉的面孔，有两个居然是我的邻居，其中一个就是那位女翻译的丈夫！这下不好办了！都是熟人，弄不好会得罪了全村的百姓，以后怎么在那里居住？但我是警察，又岂能因私废公！我让手下人将 7 个犯罪嫌疑人全部带回局里，关进我局的拘留室，由刑侦队接手这个案件，进行审讯。同时，我也将那位女翻译带到我的办公室。我必须首先做好她的工作，否则她回村里进行煽动，难保那些愚蠢的游手好闲家伙不做出蠢事来；另外，她为人权官员工作，如果有人指控我违反人权，那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，虽然说“脚正不怕鞋歪”。我首先听取了她的陈述，她的故事是：昨天夜里，他的丈夫到海上钓鱼，听见有人在海里呼救，马上过去救人。当这两个白人被救上岸时，女人突然呼救！RRU（快速反应防暴队）听到了呼救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将她的丈夫和他的朋友全部抓了起来。听了她的陈述后，我很耐心地向她解释：由于昨天抓人时，我和我的警察都不在现场，所以我目前不

能断定是否抓错了人。但请你放心，我们警察是按程序公正执法的，我们不会冤枉任何无辜者，但也不会放过任何罪犯。可能当时她也坚信她的丈夫是无辜的，强烈要求找到受害人进行辨认。我告诉她，我的侦察员当然会采取一切手段，其中包括请受害人辨认，来弄清事实真相的。与她谈话完毕，我拿来我的几瓶矿泉水和饼干，让她交给她的丈夫和其他几个犯罪嫌疑人，然后让她在会客室等候。我把刑侦队长叫到我的办公室，反复叮嘱说：“这个案子涉及到两个外国人，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妻子又是某人权官员的翻译，所以十分敏感。你要亲自督办这个案子，并告诉你的手下，小心行事，每个步骤都要严格遵守法律，不得有任何差错。另外，如有可能，尽快找受害人做笔录，尽量争取今天进行辨认，以便尽快弄清事实真相。今天下班前，一定写出初步的案情报告。”

当天，工作特别忙，由于还发生了骚乱，我们又抓了许多人。不巧的是当天我们只有一个翻译在工作，急需翻译，那位邻居的女翻译就主动来帮助我们，忙了几乎整整一天！直到下午快下班时，刑侦队员才安排由受害人进行辨认的工作。辨认的结果是，7个嫌疑人中有三个人被辨认出来，其中包括那位女翻译的丈夫；而在这7人的口供中，都惊人相似地强调当时他们在一起（由于监室有限，昨晚7人被关在同一监室，他们已经串供）。由此可以断定，如果被辨认出来的三人是凶手，那么其他人也必定是同伙。当我把辨认的结果（只说她丈夫已被辨认出来）告诉那位女翻译时，她的泪水马上流了下来！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我深为这位深明大义的翻译所感动，同时也为她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”而惋惜。

出我意料的是，在她丈夫入狱期间，一天深夜，在我的宿舍附近发生了一起盗窃案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为我做翻译，帮我抓人。如果东帝汶人都能像她一样，何愁国家搞不好。

当时，这个案件轰动了整个东帝汶。我写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快报，被复印了很多份，分发给新闻媒体、澳大利亚使馆、澳 PKF 安全官、警察总监、警察司令部值班室、帝力市局司令等等，电台里也用英语和德顿语进行了广播。

可气的是，这个团伙被抓获后，听说还有其他团伙仍然在海滨活动。据情报部门反映，在帝力市共有三个类似的团伙。为不让类似悲剧重演，我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力图将这些团伙一网打尽。其实，这只是一个全球警界常用的手法：诱捕！即找一个白人女警做诱饵，由一个男警陪伴，黄昏后到海边去装成恋人，诱捕那些家伙上钩。但由于科摩罗分局没有白人女警，这个行动不得不由别的单位来实施。一个多星期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上钩！我们都开玩笑说，那个执行任务的女警魅力不够。但后来我在与一位村长谈话中才得知，这个行动漏了风！但它的效果是同样的：当地人都知道警察在海滨设计抓人，从此之后，再无坏人到海滩去骚扰外国人。

一个多月后，早会期间，我听到了一个令我十分气愤的消息：由于人权机构的压力，法官已签署命令，将那 7 个犯罪嫌疑人保释出狱！当着众多与会同僚，我说了一句粗话：“这就是他妈的联合国！”大家也都无奈地摇头。

不祥之兆

自从帝力市局的车辆都换成了印度生产的 TATA 之后，车辆的故障成了影响工作的主要问题之一。在我局的 5 辆车中，只有我的专车还保持着较好状态。因此，我也特别小心。有一天，我带人到管区走访，路上，一个黑塑料袋被风吹到了车窗上。为我驾驶的大个子警察萨尔马上说：“这是个不祥之兆！”到了村子里，我们走错了路，车子开到一个墓地前没路了。萨尔一边倒车，一边嘴里叨咕着：“妈的，这是个死路！”我听了他的话，心里非常别扭：乌鸦嘴，什么“死路”！这时，就听到咚的一声，车子的尾部撞到什么东西上了。我们马上跳下车查看。糟了，倒车时车子的尾部撞上了半截烧毁的树桩！我仔细一看，油箱在滴滴答答地漏油。我看了萨尔一眼问道：“为什么，你这是想证明你的那个‘不祥’的预言吗？”

驾驶联合国车辆，你必须十分小心。一旦发生车祸，不但要经过写报告接受调查等繁杂的程序，惩罚也很不留情。有时，一个后视镜的镜片，就要扣你 90 美元，等你结束任务回国时，一并从你的津贴里扣除。出了车祸后，萨尔十分懊恼，几百美圆就这样没了。

打击“包考”帮

包考是东帝汶的第二大城市，包考人以勇武好斗而著称。在 FAL—INTIL 中，有很多人就来自包考。在我巡逻时，曾

经历过这样一个案子：两个家庭为争一座房子，双方动起武来。其中一个家庭来自包考，他纠集了几十个包考亲戚，手持大刀，将对手家夷为平地！当时，我曾问过来自包考的翻译：“为什么你们的人民这么爱打打杀杀？难道他们的生命就如草芥一样！”他回答我说：“你不懂我们的文化！在我们看来，如果我失败了，如果我丢了面子，那我的生命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生不如死！”

正是由于包考人有这种性格，印尼人撤离后，许多包考人纷纷来到帝力市抢占印尼人留下的房子，不知多少人因争房子死伤于包考人的刀下！最臭名昭著的中央市场黑帮，都是来自包考的年轻人。

在我管辖的科摩罗地区，也有不少包考人。其中，住在巴鲁区的包考人尤为凶悍，有的就是市场黑帮成员。最可气的是，帝力市局司令就住在该区，他的宿舍三面都住着包考人！他常提起这些惹是生非的家伙，希望我能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瞧瞧。怎奈，几次这些家伙只是“小打小闹”，我也奈何不了他们，无法解决这块心病。终于有一天，机会来了。

11月27日，当天的晚饭格外香，因为早饭、中饭我都没时间吃，白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了，才回家吃上口饭。刚吃几口，电台里传来呼叫，通知我一个村民在海边沙堆里发现了人骨头。我实在饿极了，这个晚饭无论如何要吃。我用电台呼叫刑侦队长，让他马上到现场，然后，赶紧加快吃饭速度。吃了一半，帝力市局司令在电台里呼叫，在他所住的巴鲁区，有两伙人正在持刀群殴！我再也无法吃下去了，扔下筷子，马上开车赶赴现场。离现场还有几百米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妙：巴

鲁区漆黑一片，停电！我到达现场时，我局的两辆巡逻车已经控制了那里的局势。由于天太黑，只抓到了煽动打架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小角色，主犯都逃掉了。有两人被砍伤，送进了医院。帝力市局司令正站在门前，拿着电筒，急得团团转。我跟他打了招呼，他生气地告诉我，又是包考帮干的，原因起于学校学生之间的争执。他说，目前天太黑了，让你的巡逻队留下一个在这里监视动向，再叫一个 RRU 巡逻队过来。我一面布置工作，一面用电台通知帝力市局，让他们请求发电厂，恢复这里的供电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供电迟迟没有恢复。我一看，这样不是办法，这些家伙就躲在黑暗中，我们不能总在这里守着，一旦我们离开，他们马上就会卷土重来。我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。我命令巡逻队把受伤不重的受害者从医院带回到局里，简单地询问后，让他带我们到为首的两个凶手家里去抓人。第一个凶手家比较偏僻，我带人悄悄地将他家围住，然后我和民警们提枪进屋搜查。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不见这家伙的踪影，他家里人说他出去了。我们赶紧到靠近十字路口的另外一个凶手家抓人。刚停下车，就见院子外面有个穿白背心的人站在黑影里，好像在洗脸。我跳下车，用枪顶住他的后背，用当地语低声说：“别动！警察！”这家伙身体颤抖了一下，僵住了。经辨认，这家伙正是凶手！我马上把他押上车。这时，他的老婆看见了，哭闹着过来阻拦，民警们将她拖到一边，我命部下赶快离开那里。由于警察不断地搜捕和抓人，当天晚上总算没出乱子。我回到家时，已经是深夜了。在亢奋中，我无法马上入睡，仔细考虑着明天的下一步行动。

11月28日上午,我带侦察员到巴鲁区去了解情况,在神甫(我的朋友)的帮助下,我们终于弄清了这个团伙的大致轮廓。这些家伙都来自包考,为首的是一个将近三十岁的男子,住在一印尼人留下的房子里。其他团伙成员多是些单身汉,住在村子边上的另外一所房子里。据受害人讲,为首的这个家伙并未参加昨天的袭击。无论如何,我也要给这些家伙一点儿教训,让他们知道警察的厉害。我带人直奔村子边上的那个窝点儿,刚到门口,就听见里面传来刺耳的录音机噪音。我心头暗喜:这些家伙还真在!同去的警察呼啦一下子将那间屋子围住,巴基斯坦的分队长阿什拉夫将门打开,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屋子里空无一人!我让部下仔细地搜索了整个院子,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人。我看了一眼录音机,里面的带子还没放完,说明这些家伙没走多长时间。可能是他们听到了消息,逃走了。但他们的东西还在,我想他们还会回来的,马上带人撤离了现场。

中午,我只是简单地吃了点儿东西,12点45分,我带一辆巡逻车又杀了个回马枪。我提着枪,一脚将门踹开,见里面有三个年轻人正躺在地上抽烟!我用枪示意,让他们站起来,这些家伙坐起来,见只有我们两个警察(另一个在外边门口),不但没有站起来的意思,还冲着我们乐!我二话没说,走到其中一个的面前,用枪顶住他的额头,喀嚓一声将子弹推上了膛!我一把揪住这家伙的长头发,将他拎了起来,用枪顶着他的脑袋,将其押了出来。另外两个见我们动了真格的,没敢做任何抵抗,乖乖地被押出了房门。我示意他们举起双手,趴在车上,然后让同去的警察上去搜身。在确保没

有任何凶器后，我们驱车将他们押回局里，锁进了“班房”。我们又开车返回村里，到那个头目家搜查。见有警察提着枪进了屋，他的老婆吓坏了，哆嗦地冲洗澡间里叫起来。我知道这家伙在洗澡，就站在门口外等着他。这时，村子里许多人都跑来看热闹。这家伙一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往外走，见有这么多人围着看热闹，觉得很没面子，冲着我大叫道：“我又没违法，干吗拿着枪闯进我家！”我冷冷地说：“因为有人见到那个打架的学生跑到你家里来了！”“他早就走了，我又不是他爹，他干吗要待在我家！”“我不管你是他什么人，今天我告诉你，见到他后让他马上到科摩罗警察局去自首，否则，我们将一直搜捕他，哪怕他逃回包考，我们也会与包考警方联系，直到将他缉拿归案！到那时候，他将面临着严惩。”说完，我转身上车了。其实，我只想警告一下这个家伙，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控他。

两天后，那个打人的学生到局里投案自首了。一直到我离开东帝汶，这个团伙再没敢在我的辖区生事。

打击敲诈餐馆犯罪团伙

经过半年多的重建，东帝汶的经济的确恢复得很快。我们到任务区之初，整个帝力市只有一个商店，即使在营业的时候，大门也是关着的；而现在，大街上店铺随处可见，连中餐馆都已开了五六家。与这些老板交谈，他们普遍反映生意难做，不是没钱可赚，而是社会治安环境太差，生意无法正常进行。有的老板经不住当地人敲诈、威胁、捣乱，干脆

关门走人了。

在科摩罗地区，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中餐馆，名字叫 SUPER WOK。它是由两位华侨合资经营的，经理是位广东人。由于他们的厨师水平较高，饭、菜的味道比较正宗，深受联合国人员欢迎。与所有同行一样，他们也同样经常遭受敲诈和欺凌，但中国人的一贯做法是：忍气吞声，花钱消灾。当我听说这件事时，我多少有些意外，因为我曾在这家餐馆吃过饭，也与这里的老板谈过，但他们从未提起过此事。

12月3日晚，一伙歹徒来到 SUPER WOK 餐馆，白吃、白喝不说，临走时还用大刀在厨房的鱼身上砍了几刀，威胁餐馆老板。当晚值班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，这家伙刚好从后门出来，见有警察到来，撒腿跑了。我当时虽然在宿舍休息，但我从电台里已经监听到了所发生的一切。

4日早上，我把当时出现场的警察从宿舍里叫到我的办公室，让他把情况写成一份详细的报告，我准备采取行动，遏制这种敲诈行为的蔓延。当这个警察写完报告递给我时，我问他：“当时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抓到？”“因为我到现场时那个拿刀的嫌疑人已经逃出门外，我追不上他，尤其是在黑暗中。”“换了我，知道会怎么做吗？先鸣枪示警，如他继续逃跑，朝他腿部开枪，将其擒获！”“他当时背对着我，我不能对他开枪。”“回去把联合国维和警察使用枪支的规定再仔细读一遍，下午上班时再回答我的问题！”

我带领一名侦察员，到 SUPER WOK 去访问那位老板。相互寒暄之后，我们开始进入正题。我的侦察员在一旁作笔录，为了能让他听懂，我改用英语。

“这伙人来过多少次了?”

“五六次吧!”

“那就从头一次讲起吧!”

“我们开张初期，房东让我们雇用他们的三个亲戚做保安，作为租给我们场地的一个条件，我们就雇用了现在的这三个保安。可没过几天，店里来了几个年轻人，进门后要了酒、菜，一分钱也不付，临走时还到酒柜上拿了葡萄酒，在餐馆里折腾。出门时对我说，如果我雇用他们来做保安，这个餐馆就安宁了。以后又来过几次，差不多都是这样，有时还向我们要钱，我一般是给他们 10 到 20 万卢比。”

“你的保安没有制止他们吗?”

“你知道的，这里的保安是光拿钱不做事的!”

“还不错，你的那几个保安没有帮他们!据我所知，在来你这里之前，这几个保安也是些惹是生非的家伙!你还能认出他们(嫌疑人)吗?给我们描述一下他们的特征。”

“为首的是个个子不高、肌肉强壮的家伙，常光着膀子;其他的四五个家伙……”

“为什么你们一直不报警呢?”

“报警有什么用!有几家餐馆报警后，警察也管不了，最后受损失的还是我们自己。有的已经关门走了，有的也正准备走。我的合伙人也吓得要命，这两天一直在跟我讨论撤走的问题。可我没法走，我花了这么多钱装修房子，我哪里走得了!”

“知道为什么那家澳大利亚餐馆没有麻烦吗?因为他们不向这些歹徒屈服!开始时他们遇到的问题与你们相似，他们

坚持报警,我派人将为首的家伙拿获后,再没有人去捣乱了。”

“以后我们也一样,他们一来我就打电话给你们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我管不了别人的地盘,但在我的管区,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团伙,请你相信我。”我把报警电话和我个人的手机号交给他后,离开了餐馆。

下午,我将所了解的情况写成一份详细的报告,并提出派人穿便衣到餐馆蹲守的计划。我正在写报告的时候,早上我与之谈话的那个警察来到我的办公室。

“有事吗?”

“司令,早上我与你谈话之后,我心里感到很难受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,下班后让我穿上便衣去那个餐馆蹲守,我一定能抓住他,请你相信我!”

“丹尼斯,你是个好警察,我并不是责备你。但你要明白,这个餐馆已经三番五次被敲诈勒索,如果我们无法采取有力措施,将这个团伙解决掉,我将面临很大的压力。我理解你的心情,但你去那里蹲守不合适,因为他们认识你,我需要从别的单位调来一些陌生的面孔来执行这一任务。”

“你说得对!不过,任何时候,只要你需要我做什么,我都会马上去。”

我把详细报告递交给了帝力市局司令,并着重强调,这个团伙不光是在这一家餐馆进行敲诈,他们很可能是一个专门敲诈餐馆的黑帮。我需要从特勤队抽调几个面孔比较陌生的人去那里蹲守,以便将这些家伙一网打尽。他对我的计划非常满意,很快就批准了。

从这一天起,我每天晚上派人化装成普通的顾客到那里

去蹲守，并通知值班员，一有情况，马上让巡逻队前去增援。一连五天过去了，这些家伙居然还是没有来。到第六天晚上的时候，这些家伙虽然来了，但他们并没有进屋，而是远远地从黑暗中向餐馆扔石头，等警察出去观察，这些家伙早已经跑掉了。这下子我们明白了：有内奸！餐馆的保安或其他雇员中肯定有人为这些人通风报信。平时，这伙歹徒每周都要来两次，这一周却一次都没敢进屋。他们从黑暗的地方扔石头，说明他们已经知道里面有警察！看来，必须改变战术。我把蹲守的警察撤了，让巡逻队保持警惕，晚上留一定的警力在局里（这个餐馆离我们警局很近），一接到电话马上快速出警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第二天夜里 23 点左右，我的手机响了，里面传来老板娘急切的呼救！我赶紧用电台呼叫局值班室，让他们派巡逻队去逮人。可太不巧了，远处村子里刚刚发生了一起打架案件，巡逻队都去村子里了，只留下一个 50 多岁的老警察值班！我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命令他马上带武器赶到餐馆。电台里传来他哆哆嗦嗦的声音，说他没有车。换了别人，我会让他跑步去，可他实在太老了！我刚要去发动汽车，听到电台里传来刑侦队长约瑟的呼叫，他告诉我他已经与另外一名民警赶到餐馆附近了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关键时候，约瑟总是能冲上去，真是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”啊！有他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不一会儿，约瑟得意地用电台向我报告，他们已成功地将一名嫌疑犯抓获！我让他转换到其他频道，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。

可能他们已经知道警察在盯着这个餐馆了，这伙歹徒变

得相当狡猾。他们没有像以往那样在餐馆营业时间来，而是选择了营业刚刚结束、餐馆的员工和老板一家正在吃饭的时间跳进来。进屋后，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家伙一把将餐桌掀翻，抄起一把椅子朝老板扔了过去。其他几个家伙假装过来劝解，乘机向老板勒索钱财。一个家伙说：“要过圣诞节了，手头紧，需要钱花。”老板只好掏出 20 万卢比给了他们。临走时，这些贪心的家伙还扛走了一台电风扇。也可能正是因为这台电风扇，影响了他们逃跑的速度，导致他们被擒。当时，约瑟和另外一名警察正开车回家，听到我呼叫巡逻队，马上掉转车头，急速赶往现场。当他们到达餐馆时，这些家伙已经逃出 200 多米，约瑟开车急追，终于将其中那个喝醉了酒、逃得较慢的家伙擒获。押到局里后，从他的身上搜出 100 多万卢比！可见，他们是个专门进行敲诈勒索的黑帮。我命令约瑟将这伙人锁进监室，并用手铐将他铐在铁门上，防止他逃跑！

第二天的早会，又成了我露脸的“一言堂”，听说我又将这个团伙拿住，与会的帝力市局司令和其他同僚们无不点头赞许。

这个落网的歹徒还真是个硬汉子，无论如何也不肯供出其他同伙。我对刑侦队长约瑟说：“他不是不说吗，把证据收集齐全，告诉法官，从严重判这个家伙，让他蹲在北考拉监狱里面自己受苦吧！”

自从我将这伙人擒获，直到我离开东帝汶的那一个多月里，再没听说哪家餐馆受到过敲诈。

与女孩保持距离

巡警分队长马内是跟随我时间最长的警官之一。在巡逻队时，他就非常愿意与我一起巡逻。他常说，与你一起工作我觉得没有烦恼。但他却经常给我添些烦恼。

有一次，下午来上班，他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向我报告说，今天，他遇到了麻烦。中午做饭时，他请的当地保姆将自己的18岁女儿也带去一起帮忙。当地的好事青年感到嫉妒和不满。不知是谁，向他的房顶上扔了一块儿大石头，将屋顶砸了个大洞。我逗他说：“你看，是不是你与当地女孩太近乎了？以后要跟当地女孩保持距离！”他笑着说：“以后我告诉那位保姆，不许将女儿带到我的住所就是了。”

可没过几天，他又有了新的麻烦。早上巡逻时，他将一个在他车前猛拐弯的摩托女郎刮倒了。这下坏了：因为当地人认为联合国的人很有钱，经常想办法讹诈联合国人员的钱财，特别是这种交通事故。有一次，一位联合国维和警察开车撞死了马路上的一只柴狗，主人竟然讹了他500美元！若是当地人将这狗撞死，连10个美元的赔偿也拿不到。我闻讯赶到医院时，那个摩托女郎正躺在病床上假装痛苦地呻吟着。但从现场事故描述上，我知道她并没受什么重伤。马内神情紧张地站在门口不知所措。我当即作了两点指示：首先，不要急于私了，受伤程度要听医生诊断而不是个人陈述；第二，马上请交通事故调查科来认定事故责任，赔偿与否要看谁是责任一方。这两项结果出来之后，当然对马内很有利了。为

了缓解马内和其他在场警察的紧张情绪，我开玩笑地说：“你看，我早告诉你了，让你与当地女孩保持距离，可你就是不听。怎么样，太近乎没好处吧！”他挠着脑袋乐了。最后，虽然交通事故科认定责任在对方，但马内还是花了 300 美元，作为帮助对方修理摩托车和赔偿所谓在事故中丢失了手机的费用。

满腔热忱帮助当地人民

到达任务区之初，联合国培训官员给我们讲课时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血淋淋的镜头。我当时从内心里，常常抑制不住这样一种冲动：尽快到达任务区，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人民。到达东帝汶之后，作为一名执法者，我们每天都接触当地社会阴暗的一面，很容易产生厌恶情绪。在我任科摩罗分局司令官期间，我在打击当地猖獗的犯罪时，的确是毫不留情的，也因此获得了 ACTION COMMANDER 的称号。有些从国内去的民事人员朋友不理解，说我们这些做警察的有心理偏差，看谁都是坏人，需要去看医生。但在我内心深处，对那些苦难人民的同情和爱心，一直都没有泯灭。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信念：对罪犯的打击就是对善良公民的爱护！因为善良的人民渴望的是和平、安定的生活，这也正是我们这些警察的职责。在执法过程中，我也注意正确区分案件的性质，并不是蓄意将所有的违法者都关进监狱。

在我下班回宿舍的路旁，有一个小型蔬菜、水果市场，我们常顺便到那里购买蔬菜和水果。平时，我并不喜欢购买当

地人的任何东西，原因是他们对当地人和联合国人员区别对待，采取不同价格，当地政客还振振有辞地为这种做法辩护。问题是这种漫天要价式的销售，不管其实际价格是高还是低，给联合国人员的印象都是自己受到了欺骗。在那个菜市，有一对⁴⁵岁左右的夫妻小贩，很爱开玩笑。但我并不太喜欢他们，原因是他们很狡诈，要买他们的东西必须多费口舌，否则你可能要多付成倍的钱。有一天早上上班后，值班员照例向我汇报昨晚发生的案件和处理结果，告诉我只有一个家庭暴力案件发生，丈夫因将妻子打伤而被关进了我们的监室。我路过监室时无意地看了一眼，发现有些面熟，仔细一看，竟是那个菜市的小贩。见到我后，他很不好意思，加上十几个小时被关在里面，像那些多日卖不出去的茄子，耷拉着脑袋，没有了往日的精神。我把翻译叫过来，仔细地了解了他的案情。

原来这只是个普通的家庭暴力案件。这位老兄因喝醉了酒，回去与老婆吵了起来。情急之下，他就动起粗来，将老婆打了一顿。他老婆岂是盏省油的灯，一气之下，到警察局报了案。因为她的胳膊和腿部都有伤痕，警察就将这个丈夫拘捕并关了起来。在东帝汶，大男子主义现象非常严重，这种家庭暴力案件经常发生。一般，夫妻双方都不愿意闹上公堂，那样对夫妻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。根据印尼《刑法》，如果受害人报案，警方将侦查此案并提起诉讼。一般的侵害，犯罪嫌疑人可以被判入狱几周。当时，帝力市局专门有一个受理此种案件的“易受侵害者保护组”。我见这位老兄一副懊悔的样子，考虑到他们平时夫妻还很恩爱，我决定想办法帮助

他们。我对他讲明了法律规定和他可能受到的处罚，然后劝导他：“你如果不想被关进监狱，那么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——你的老婆。如果你肯向她诚恳道歉，请求她宽恕你，她就可能撤消对你的指控，警方就会将你释放。”听了我的话，他忙不停地点头：“我愿意道歉，我愿意！”我派人去将他的老婆找来，让翻译将她带到我的办公室，我向她解释：“你能依法维护你的权利是对的，但由于你的指控，他可能被判入狱几周。如果是这样，对你们的感情会不会有影响呢？现在，如果你不想让他入狱，那你只能撤诉。”这个中年妇女哭了：“其实，我只是想给他一点儿教训！如果他能保证以后不打我，我愿意撤诉，我不想让他坐牢。”这时，帝力市局“易受侵害者保护组”来电话，让我们把案件移交给他们，因为昨晚他们已经收到了我局警察移送的案卷。没有办法，我找了些食品和水，让这位丈夫吃完早餐后，将他移交了。后来，我又想方设法帮助他们，最终使这个丈夫获得了释放。现在，两个人又恩爱地开着夫妻店。

事隔不久，我又去那里买水果，发现整个菜市的十来个商贩对我都很热情。我买了一把香蕉，这夫妻俩不肯收钱。当我硬是把5万卢比塞到他们手里时，他们又说票子太大（相当于50元人民币），找不开！我去找其他小贩换钱，大家一起摇头。我只好第二天才将钱送去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不好到那里买东西了，因为这些小贩都在想办法不收我的钱。他们都是穷人，我怎么能让他们受损失呢！

在东帝汶的一年中，我们的宿舍属于条件比较差的，有的同事提出搬到一个条件较好、离市中心较近的风子里去，我

却一直态度不积极。我们的房子虽然不好，但我们的房东和邻居们却不错。我们宿舍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偷盗的事情。我们有两个邻居，都是单身的青年，他们的悲欢离合故事或许很有代表性，不知还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家庭。

其中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叫阿留，是个汽车司机。由于他能说些英语，我常去与他聊天，印尼统治期间，印尼从全国各地招募了许多教师，到东帝汶教学。阿留爱上了一个来自爪哇岛的年轻女教师，二人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。动乱发生后，他的妻子不得不带着不满周岁的次子逃回爪哇的娘家。这样，阿留只好将长子送到乡下的父母家里，过起了孤家寡人的生活。我问他是否还与妻子有联系，他摇了摇头，已经半年多没通音信了。我问他：“你有没有岳父家的电话号码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不给她打个电话呢？”“我没有钱，买不起手机，别的电话又不通。”我让他找来岳父家的电话号码，用我的手机为他接通了电话，使这个与爱妻分别半年的丈夫又听到了妻子的声音，当他用颤抖的声音与妻子说第一句话时，我和其他的几个邻居一下子都静了下来。我虽然听不懂他说的是是什么，但从旁边邻居的脸上能够看出，所有的人都被他们感动了。他通完电话，将手机还给我时，手还在颤抖，满眼是泪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很久。妻子又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，我们共同为他筹划着未来。他决心痛改酗酒的毛病，加倍努力，为未来与妻子重逢而攒钱。从此之后，我们约定，我每月让他用我的手机给妻子打个电话。尽管到印尼的国际长途收费很昂贵，但我始终没有吝惜过，因为当我看到阿留那激动和幸福的表情时，我的内心也感到非

常温暖。

另外一个邻居叫约翰，今年 22 岁。他的父亲在动乱时逃到了西帝汶，一直音信皆无。据个别从西帝汶返回的难民说，有人曾在西帝汶难民营见过他父亲，有的说他父亲已经死了。但每当有大的难民船从西帝汶返回时，他都伫立在码头上望眼欲穿地等待，直到最后一辆运送难民的卡车开走。

我们到那里时，他的处境非常艰难。走进他的家里一看，真是家徒四壁。那时，他经常断炊。我曾几次送大米和衣服给他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约翰是个好青年，在我们的鼓励下，他学习十分刻苦。深夜里，常能看到他拿着一本破字典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学英语。他的英语进步很快，没过几个月，已能流利地与我交流了。由于他能讲些英语，附近的朋友为他在世界粮油组织的仓库找到了一份工作。现在，他已能通过自己的劳动，自己养活自己了。

我觉得自己好像离开东帝汶很长时间了，阿留、约翰，你们生活得还好吗？

我要破产了

记得在培训的时候，教员曾叮嘱我们：在联合国工作，不论谁让你签字，你都得小心！在建局过程中，我起草了很多文件，申请各种通讯、办公和其他设备。每次领东西或设备时，主管部门都要求我亲自签字。当我将要离开任务区时，这些签字给我带来了很大麻烦。当我到联合国主管财产的部门办理离境的手续时，我发现所有我局申领的财产都记到了我

个人的名下，我欠了联合国上万美元！望着这些财务清单，我愁眉苦脸地对那个老头子说：“你这不是让我破产吗！”

我费了两天时间才把这些账单理清，把财产办理了移交手续后，才拿到了财产部门允许我离境的手续。

司令官与兄弟

在联合国做一个部门的主官，最大的困难就是把这些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地区，有着复杂文化背景的人员凝聚在一起。我任科摩罗分局司令官期间，曾经有三十来个国家的警察先后在我局工作过。无论是来自欧美的，还是来自亚非的；无论白人、黑人，还是其他有色人种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发自内心地尊敬和爱戴我，是因为我始终秉持这样一些管理原则：公平、公正，无远近、亲疏；任人惟贤，杜绝种族歧视；工作上严格管理，生活中关怀、爱护；以身作则，有危险身先士卒。

记得全局第一天开始正式运转时，我对全体警察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Please remember, I’ m not only your commander, but also your brother.（请你们记住，我不只是你们的司令官，也是你们的兄弟。）”对我的这句话，大家报以热烈掌声！我知道，其实大家喜欢的是后半句，因为很少有一个长官会这样称呼其下属。但我也深深懂得，只有后半句是不够的。

种族歧视在联合国永远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在处理任何涉及到人的问题上，都必须考虑这个因素。有时，即使你

不是真的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，也可能被别人误解。特别是一些来自小国家的有色警察，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。在东帝汶任务区，来自亚、非、拉三洲的警察占整个任务区警察总人数的大半，如何处理好种族问题，做到公平、公正，是能否增加凝聚力的关键。

可能因为我自己来自亚洲，广大有色警察对我并不存在太大戒心。我在选择副手和任命其他职务时，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。

有一次，一位新到任务区的大国警察被我的上司直接任命为我局刑侦队队长，而且有传言等我走后由他接班。我不同意，找到上司，与他争辩起来。最后，他说我原来的刑侦队长英语不如这位新来的高级警官，我无法再与他争辩了，因为英语是他的母语！况且我们之间关系不错，我不可能因此而无休止地与他争下去。当这个任命传达到我局警察当中时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他们纷纷找我，让我提出抗议。我向他们解释说：“我已经尽力了。不过，请你们放心，如果他确实像所推荐的那样是刑侦专家又有能力，我们支持他；但如果他是个没蛋的家伙，就无法在此混下去，因为这是科摩罗！”

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侦查案件，而是找自己队员的毛病，使我非常反感。他也很不走运，当晚管区内发生了几起案件，我马上用电台通知他出现场。因为我当时已亲自到局里指挥，他丝毫不敢怠慢。那一晚上，他先是挖人骨头，后是去抓人，一直弄到半夜才回家。第二天早上上班时，他抱怨说仍然感到非常疲惫。他的队员都说：这有什么，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！我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：“你

尽快把昨晚的案情报告写出来，我开会时等着用！”“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。”“我想你不会有问题的，因为他们推荐你时，理由是你英语很好，写报告很快！”我去开会之前，他终于满脸通红地将报告递给了我。我看了一遍，当即指出有两个词拼写错了。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，由于时间太紧，他没来得及检查。当天下午，他来到我的办公室，无奈地对我说：“我以前在国内并不是干刑侦的，而是管理武器的。在这里工作我感到很吃力，请求调到别的单位。”我心想，为什么你不早说呢！嘴里却说：“真遗憾，好不容易又来了个好警察，又要调走！不过，我们是朋友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”第二天他就走人了。后来，这个故事成了我们的笑料。

在我提升的管理人员中，惟一有过争议的是约瑟。在不到半年时间内，我三次提拔他。而这位来自葡萄牙的警官也很爱表现自己，这曾招来一些人的不理解 and 不满。有的人私下里说，他能如此快地升迁，是不是因为他是白种人？但我不为所动，始终如一地支持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是个既勤奋又勇敢的好警官。当他被我提升为新成立的刑侦队队长后，他率领只有5个侦察员的队伍，负责整个东帝汶30%刑事案件的侦察，不但没有给我丢脸，破案率反而比以前帝力市局刑侦队大大提高。那时候，刑侦队每一个队员往往都超时工作到很晚才回家，而约瑟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离开。他的表现，受到了全体警察的一致赞扬。当然，我的慧眼识英雄，也得到了从我的副手到普通警察的尊敬。而另外一位来自西欧的白人警察，只是一名普通的侦察员。对待大国与小国问题上，我也本着所有警察一律平等的原则。就拿俄罗斯的刑侦专家尼

可莱少校来说，他的确很出色，但问题是他的队长约瑟比他更出色，所以我只能让他做一名普通的侦察员。当然，尼可莱少校也很理解这一点，对此从不计较，工作非常努力。

警衔的问题有时也很棘手。联合国有一条明文规定：到任务区之后，联合国将根据个人能力考虑每个人的工作和职务，而完全不考虑他在本国的警衔。但在实际工作中，有一些警衔较高的警察却始终放不下这个架子。

在我局有一位来自非洲某小国的警察，曾令局里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感到头疼。他的警衔只是个上尉，在局里有着众多中校、少校、警司、警督的情况下，这本来不能算很高的警衔，但他却始终称自己是高级警官。许多警官对他这种说法颇有微词，我曾为他解释说：“说来也难怪，我们不是经常听说在非洲某某中尉发动政变，当上了总统吗！”但这位先生却经常以此为由，拒绝工作，让大家很恼火。比如说，他的队长让他去指挥交通，他就争辩：“我不会！像我这样的高级警官在国内怎么能去指挥交通呢！”于是，我不得不让别的警察与他同去，给他学习、锻炼的机会。同时，工作中他是个既懒惰又胆小的人，几次误事，他的队长批评他，他不但不服气，还与上司争吵。我先后几次找他谈话，他开始都很嘴硬，过后又来找我检讨。最后，他竟然当着我和其他警察的面，与我的副手激烈地争吵。我实在不能再容忍他了！我将他的几次不服从命令与别人争吵和违纪现象写成一个详细报告，递交给了纪检部门。考虑到他只剩一个月就要离开任务区了，我在最后的处理意见上只写了一句“调离帝力市

局”。报告递上去之后，我又找他谈了一次话，告诉了他我的决定。最后我对他说：“你已经多次与同事吵架，违抗命令，按规定我可以建议遣返你。我们朋友一场，我不想让你难堪。但现在，你又同我的副手吵了起来，以后在这里工作已经很困难了，所以我建议把你调出，希望你能理解。”他眼圈红了，过来使劲地握了一下我的手，转身走了。

几天后，当我局的刑侦队员到监狱去送犯人时，见这个警察正尴尬地坐在监狱门口。他已经成为一名狱卒了。

在工作上，我以对部下严格要求著称。有一位战友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你的英语学得可不怎么样！在电台里，我听到你所有的通讯几乎都是祈使句，很少有陈述句。而且都要加上诸如‘马上、立刻、5分钟、10分钟’之类的时间副词。”但在生活方面，我对部下的关怀，也是其他司令官所无法相比的。比如有的警察生病、接站之类的事，如果巡逻车一时有事，我就亲自开车去接送他们。有的警察有重要活动需要用车时，我都是把我的专车借给他们。这样，他们既方便又感到有面子。

有一次，两个来自西亚的警察回国探亲，因他们国家每周只有两班飞机，所以无法按时返回。当时，纪检部门已在讨论他们的处分了。回来前，他们给我打了电话，电话里他们对我实话实说，我对他们说：“如果你们生病了什么的，别忘记在国内开个医生的诊断来！”他俩当然心领神会。后来，正是因为他们有医生的诊断，才免受了与其他同伴相同的处分。为了表达该国全体警察对我的敬意，他们在召开分遣队

会议和举行授勋仪式时，我与警察总监少数人应邀成为了他们的嘉宾。

在我结束任务回国时，联合国在我个人的表现评估中，特别赞扬了我出色的管理才能。